

当信号开始吞噬自身：AI 如何制造经济的“价值空转”

作者 鲍锦朝 · SDE 学员 · 约 3.6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4日

摘要 · ABSTRACT

关于生成式 AI 的经济影响，主流叙事始终围绕“效率革命”或“劳动替代”展开。本文认为，这些分析未能穿透 AI 最根本的经济病理：一场由技术引发的“信号生成短路”正催生出更深层的“价值空转”。这不是市场信号失真或“柠檬市场”的升级版——而是一种全新的系统性病变：市场机器仍高速运转，但它输出的不再是经“具身检验—信号—信任”链条产出的价值，而是在一个由 AI 说法、被劫持的数字与定制化道理组成的闭环内自我循环的虚假价值。本文论证：信任的生产，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物理-生物性约束：它必须经由多重独立观察者将自己不可复制的身体与时间作为赌注，在不同时空、不同情境下进行冗余、浪费且无法被任何中心化算法统合的交叉检验，最终在共同体中凝结成一种“具身共识”。AI 对这一“价值-信任”转化链的系统性短路，使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去肉体化”危机。抵抗这场危机的据点，因此不在于发现任何尚未被污染的“信息”或“商品”——那不过是发现学的幻觉——而在于：当虚假信号的“轻”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灾难时，那些强制要求身体在场、时间投入与无法被算法压缩的创造性挣扎的社会场域——本文称之为“重度发生”——其经济稀缺性被反向逼升出来。这不是对“本真性”的浪漫回归，而是空转废墟上逼出的次优结算。本文进一步审视了具身共识在历史上的暧昧性——“身体在场”在宗教仪式与权力制度中曾被用来制造最大规模的虚假共识——从而将论证从“回归身体”的发现学陷阱中释放出来，指明真正的锚点不在于“身体”本身这一物理事实，而在于检验者意图的绝对独立性与不可协调性这一发生学条件能否在制度中被持续地发生出来。最后，本文以三个相互咬合的案例深描展演了空转回路从启动到崩塌的完整链条，正面回应了“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的收编挑战，并给出了整个理论的可证伪条件。

关键词：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信号理论；价值空转；具身共识；重度发生；发生学经济学；独立意图；虚构锁定

一、引言：当指南针开始自己旋转

经济学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套它赖以运转、却常常隐匿于深处的“认知契约”。这套契约并不规定什么商品该卖多少钱，而是规定了更根本的事：一个东西“有价值”这件事本身，是如何被我们知道、被我们承认、并最终成为我们行动依据的。这套关于“价值如何被确证”的机制，是一切交易、定价与市场逻辑的终极底座。

在传统互联网经济的黄金时代，这套契约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强化。搜索引擎、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将“一个东西好不好”的判断权，从传统权威——品牌故事、专家声誉、文化光环——手中夺走，交付给一套看似客观、民主且即时的“量化信号”系统来裁决。一件产品的价值，越来越不在于它的广告文案说了什么，而在于它在亚马逊上的销量排名、用户评价和价格比较曲线上的位置。一个观点的影响力，不再依赖于媒体背书，而在于其转发量、点赞数和完读率构成的量化图谱。我们可以将这一进程概括为一套精巧的工程：用可量化的信号为纷繁的说法定价。

这套工程的伟大成就在于，它将无数沉睡的、潜在的交易从信息迷雾中解放出来。在那个时代，销量排名和星级评分之所以能充当信任的锚点，是因为它们与一个生成性事实之间存在着虽不完美但大体可靠的因果链条：一万条评论的背后，必然站着一万个活生生的人；这些人在不同的厨房里、在不同的水质和温差下、在不同的心情和期待中，用自己的钱、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身体，真实地使用过这把水壶。他们的评价——包括那些因为自己没拧紧盖子而怪罪产品的差评，包括那些仅仅因为物流太慢而打了三星的反馈——共同构成了一片由大量偶发性与冗余性交织而成的具身检验史。信号系统所做的，是将这片极度冗杂、难以直接处理的检验史，压缩成一组可排序、可比较的数字。信号是检验的影子。检验在前，影子在后。身体先检验，信号后出现——这是那条契约得以成立的默会前提。

然而，一场深刻的背叛正在发生。以大型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最根本的经济学本质，不在于“更聪明地处理信息”，而在于它第一次赋予了信号生产系统一项它从未拥有过的能力：大规模、低成本地自主生产那本该由具身检验史来填充的“说法”本身。过去的算法只能索引、排序和推荐已经存在的人类叙事；如今的 AI，却能瞬间生成一万条不同语气、不同角度、极具说服力的产品评价、使用体验或专家分析。信号不再是检验的影子。它可以在检验从未发生的虚空中，被预先制造出来，其外观完全复刻了那本该由一万人用身体和时间共同织成的冗余共识的投影。

本文要论证的是，这场由 AI 赋予的“说法自主生产”能力，所引发的并非仅仅是市场信号的失真或信息污染的加剧。它触发了一种更深层、也更少被理论化的经济病理：旧的信号-信任契约赖以运转的那条时间之箭被技术性地截断了。但截断本身只是一个触发事件——真正将截断扩大为系统性危机的，是截断发生后，平台算法、卖家动机与消费者认知惯性这三个原本互相制约的力量，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相遇，逼出了一个此前无法存活的、可自我循环的虚假价值回路。

这个回路的运作逻辑如下：当说法可以被无限地预先制造，并成功地诱发出第一波真实的人类消费行为时，这些真实的肉身行为数据便会被平台的排名算法所捕获，转化为销量、星级、人气榜单这些最“硬”的数字信号。一个起初由虚假说法驱动的平庸产品，由此穿上了一副由真实行为数据锻造而成的畅销品铠甲。随后，资本、媒体和行业分析机构围绕这些已经站住脚的数字信号，生产出海量的“道理”——投资报告、商业模式分析、行业趋势叙事——来论证其合理性。而 AI 工具本身，现在也大规模地参与到了这个“道理生产”环节之中。一个说法、数字与道理相互背书、自我强化的完整回路，就此闭合。市场机器仍然高速轰鸣，信用货币仍在流动，交易数据仍在攀升，但驱动这一切的，不再是那个“真实价值发生→信号传递信任”的生成性链条。链条被从中间截断了。真实的价值发生（耗费身体、时间与创造性挣扎的具身检验）尚未开始，它的外观——说法、数字、道理——就已经被大量预先生产出来，填满了整个市场空间。

本文称这种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疾病为“价值空转”。此处的“价值空转”需要做一个三层区分，这个区分对于下文的论证展开至关重要：在最具操作性的层面，它指涉一种具体的企业策略——特定卖家使用 AI 工具生成虚假说法、劫持算法排名、完成数字洗白的操作路径（可称为“空转路径”）；在更高层面，它指涉由无数这类策略与平台算法逻辑共同编织而成的系统性后果——整个市场生态中出现了一种不需要真实价值发生即可自我维持的信号循环；在最宏观的层面，它指认一种历史分期——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轻”（虚假信号的零成本生产）与“重”（真实具身检验的不可压缩成本）之间发生根本性价值重估的时代。本文的论证重心，落在第二个层面：作为系统性后果的价值空转，其发生学机制是什么？它不可被既有理论 1:1 替换的核心特质在哪里？它逼出了什么样的反向市场运动与社会条件？

这不是经典信息经济学中“市场失灵”的又一种变体。在失灵的市场里，信号与价值之间的连线虽然扭曲或断裂，但那个“连线”本身在逻辑上仍然被预设为应当存在。而在价值空转的闭环里，那根连线被整个地抽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 AI 驱动、在符号世界里飞速自我循环的“价值之名”，它不需要、也没有任何时刻必须闭合回到那个由人类身体进行的、真实的“价值之实”上。这也不是对博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拟像”理论的技术升级版。博德里亚描绘了一个符号与真实脱钩、最终自我指涉的苍凉宿命；但他从未处理那个关键的、属于经济学的内核：这个自我指涉的符号系统，是如何必须周期性地伸出一只钩子，牢牢钩住一个真实人类的身体行为——一次点击、一笔付款、一次消费——来完成它的“洗白”与自我证实。这个从符号世界到肉身世界的强制性闭合动作，正是 AI 时代经济病理最核心的秘密。而这一秘密，也将我们引向那个最根本的追问：当信任无法再从“说法-数字-道理”这个旧三角的内部生产出来时，它还能从哪里长出来？

答案，指向了一个我们长久以来因为太过熟悉而视而不见的绝对边界：信任的生产，存在一个不可被算法逾越的物理-生物性约束。这个约束就是：信任必须由多重独立的、用自己的身体与不可逆的生命时间作为赌注的观察者，在不同时空、不同情境下进行大量冗余、浪费、且无法被任何中心化算法预先统合的交叉检验，最终在共同体中自发凝结成一种坚韧且难以被瞬间篡改的共识——本文称之为“具身共识”。AI 可以模拟这个共识的文本结果，但永远无法真实地替代这个发生过程本身。因为这个过程需要消耗一种 AI 没有的东西：必须走向终点的、唯一的、不可逆的生命时间。

对这一边界的指认，迫使我们彻底重置分析的坐标。曾经统治经济学思想大厦的那些核心概念——信息、效用、偏好、信号——在 AI 的冲击下，都面临着一场深刻的贬值。如果信任无法再从信息的透明和信号的效率中自动涌现，那么经济学最核心的稀缺，便从“信息的缺失”转向了“发生重量的缺席”。抵抗“价值空转”的据点，因此不在于发现任何尚未被污染的“信息”或“商品”——那不过是“发现学”的幻觉，幻想在废墟之下还埋着一块干净的净土。本文的立场截然不同：当虚假信号的“轻”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灾难时，那些无法被算法压缩的“重”——身体在场、时间投入、创造性挣扎——其经济稀缺性被反向逼升出来。本文称这种市场结算为“重度发生”。它不是被发现的本质，而是被空转危机逼出来的次优解。

然而，本文的论证如果止步于此，将犯下一个危险的错误：它会把“重度发生”写成一块脱离历史的、玫瑰色的净土，仿佛“身体”天然就是抵抗虚假信任的锚点。但历史证据恰恰相反。早在一万条亚马逊评价出现之前，宗教仪式、宫廷礼仪、中世纪的圣物崇拜，也都曾是高度“重度发生”的场域——它们强制要求身体在场、时间投入与精神挣扎，却被用来生产和维持的，恰恰是最大规模、最牢固的虚假共识。换言之，具身共识这个信任生产机制本身，在历史上是不干净的。它既可以产生真实信任，也可以成为制造虚假共识的最有效机器。决定其走向哪一端的，不是“身体是否在场”这一物理事实，而是另一个更深的发生学条件：检验者的意图是否被一个统一的权力中心或算法逻辑所协调。

这正是本文与一切“具身=真实”的发现学叙事的根本分野。本文的真正论点，不是“身体比 AI 更真”，而是：在 AI 截断了旧契约的信号-信任链条之后，人类被迫在废墟上重新寻找能够满足信任生产所需条件的锚点；在当代技术与制度条件下，那些能够同时满足检验者意图的绝对独立性与不可协调性的场域，恰好大量地表现为“重度发生”的形态——不是因为“身体在场”有什么形而上的魔力，而是因为当前的对抗格局中，那些让不可协调的独立意图得以持续发生的社会条件（独立的经济基础、不受统一算法逻辑支配的检验动机、可被共同体追溯的检验过程），与“身体在场、时间投

入、不可逆成本”这些特征高度重叠。换言之，“重度发生”是被空转危机逼出来的次优结算，不是被回归的本质；而结算出这个形态的核心变量，不是“身体”，而是“独立意图的发生条件”。

由此，本文试图重新勾勒一个已被忽视的价值生成的底层逻辑。一场抵抗“价值空转”的战役，其最深刻的据点，不在于守护任何特定的商品或体验形态，而在于守护和创造那些让不可协调的独立意图得以用身体和时间进行交叉检验的社会条件。本文将依次展开：第二部分重访互联网经济学的旧契约，追溯其默会前提——尤其是“说法-数字-道理”三层结构本身——在什么历史矛盾中被逼出来，又在 AI 面前如何暴露出其本体论脆弱性；第三部分以三个相互咬合的案例深描为血肉，展演空转回路从启动到崩塌的完整链条，并在其中正面迎战“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的收编挑战；第四部分界定“价值空转”作为系统性后果的核心发生学机制；第五部分论证为何“价值空转”不能被博德里亚的“拟像”、表演性理论、路径依赖理论以及波兹曼的“技术垄断”等已有概念所覆盖；第六部分正面建构“具身共识”这一信任的物理基底概念；第七部分分析“道理”沦为可量产辩护后的认知危机；第八部分论述“重度发生”作为新稀缺的发生逻辑——严格将其锚定在“被逼出来的次优结算”这一发生学判断上；第九部分严厉审视具身共识在历史上的暧昧性及其在当代被资本收编的风险，并正面展开“独立意图”作为一种发生学条件、而非一种静态本质的论证；第十部分勾勒一个以“具身共识场”为分析单位的经济学初步框架，克制地定位其与威廉姆森“资产专用性”的关系；结论部分则给出整个理论的可证伪条件。

本文的整座论证大厦，建立在一个可以被检验的根基假设之上：人类作为一种生物，其赋予信任的行为——特别是支撑长期、复杂、高风险决策的深度信任——有着无法被技术迭代彻底抹除的具身性硬约束。这个约束的核心，不是“身体”作为物理实体的在场，而是多重独立意图通过不可逆的生命时间进行交叉检验这一发生过程，无法被任何单一协调中心所模拟。如果这一点错了，如果实证证据表明，完全由 AI 驱动的符号闭环能够在长期、跨文化的尺度上培育出比真实具身检验更坚韧的信任，本文的整个理论将崩塌。反之，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守护每一个普通人用自己不可逆的生命时间进行真实检验和创造的权利——以及守护那些让这一权利不被一个统一算法协调所取代的社会条件——将是这个被 AI 虚假轰鸣所席卷的时代里，经济学最值得坚守的物理与伦理双重底线。

二、旧契约的“默会肉身”：一个分析框架的历史发生

要理解 AI 带来的断裂有多深，我们必须先返回传统互联网经济学的现场，去审视那套旧契约是如何运作的。但不是把它当成一个静态的“说法-数字-道理”三层结构来拆解——那样做只是给既成秩序画一张更清晰的解剖图。相反，我们必须追问：这三层结构的支配地位，分别是在什么矛盾中被逼出来的？它们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在历史中经历了怎样的推移？让这个分析框架本身从历史矛盾中“发生”出来，而非作为既成的分析工具被宣读，这本身就是发生学纪律的体现。

第一幕：说法的危机与信号的崛起。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漫长商业史中，关于商品价值的叙事——“说法”——几乎垄断了信任的生产。品牌故事、工匠声誉、产地传说，充当着产品质量的主要信号载体。但这套系统的脆弱性也恰恰在于说法本身：模糊、主观、极易被一个统一的叙述意图所操纵。在一个纯粹由说法支配的市场里，逆向选择的幽灵无处不在。卖家可以无限夸大其产品的品质，而买家在消费之前几乎没有独立的检验手段。这正是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在 1970 年诊断“柠檬市场”时抓住的核心困境：当品质信息不对称且卖方可以无成本地伪造说法时，市场会螺旋式地驱逐优质产品。互联网的降临，在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博弈的结构。电商平台引入的销量排名、好评率、价格比较系统，社交网络提供的转发量、点赞数、完读率，将“一个东西好不好”的判断权，从可以被一个主体随意书写的说法手中夺走，交付给了一套看似客观、民主且即时的量化信号系统。这并不是简单的“数据化”——这是一场深刻的价值定义权转移。说法的垄断地位第一次受到了实质性的挑战。而推动这场转移的，正是说法系统内部那个“模糊性与可操作性”矛盾的激化：当市场扩大到陌生人交易的规模，说法本身已无法承担生产信任的功能，它逼出了一个外在于它的裁决者——数字信号。

第二幕：信号的称霸与“道理”的出场。随着量化信号在市场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一种新的矛盾浮现了。“刷单”、“水军”、“僵尸粉”——这些操纵手段的出现，暴露了数字信号系统的一个内在脆弱性：如果生成数字的行为本身可以被伪造，那么以行为数据为基础的信任机器就会失灵。正是在这个矛盾的逼迫下，旧契约的第三根支柱——“道理”——被推到了前台。经济学家为平台的高估值构建“网络效应”和“双边市场”的理论模型；管理学家用“颠覆性创新”的叙事来稀释人们对平台垄断的恐惧；法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则为这套系统提供“程序正义”和“算法中立”的辩护。道理的功能，是在数字信号的表面之下，为整套裁决体系的制度设计提供深层的合法性论证。哈耶克（F. A. Hayek）关于价格系统是一种“发现程序”的知识论论证，就是这一脉“道理”生产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源头之一——它把市场定价的数字信号，提升到了认知论的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层结构的支配关系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先后被不同的历史矛盾逼出来的：先有说法市场的信任危机，逼出了信号；后有信号的被操纵危机，逼出了道理。而这三者在传统互联网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维持着一种尽管充满张力、却大体稳定的契约：数字为说法定价，道理为数字辩护。这套契约俨然成为互联网经济学的“自然秩序”。

然而，这套契约的根基，建立在一个我们长期视之为理所当然的默会前提之上。这个前提，并非“数字不会说谎”——我们一直知道它会。旧契约真正依赖的默会前提，隐藏在更深的层面：我们默认，那最终支撑起真实数字价值的——比如一个真正的好产品、一项真正好的服务——其“好”本身，必

然先在真实的世界里，经由许多活生生的人用他们的身体、时间和注意力完整地、冗余地检验过。而那些负责检验的人，与生产“说法”和操纵“数字”的人，并不是同一批人，也不共享同一个明确的操纵意图。

一个在亚马逊上获得一万条好评的保温杯，我们之所以能信任它“大概率是个好杯子”，并不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一万条评论每一句都出自真诚的个体。我们真正信任的，是藏在这一万条评论背后的一个无法被单一利益主体伪造的、包含了大量偶发性与冗余性的“具身检验史”。这一万个评论者，分布在天南海北，购买动机千差万别，使用情境大相径庭。他们用自己的钱（一个不可逆的经济赌注）、自己的时间（一段不可追回的生命）去买了这个杯子，在不同水质、不同海拔、不同温差下实际使用；他们中有人给出了五星，因为杯子的某个细节恰好击中了他独特的痛点；有人给出了一星，因为他自己没拧紧盖子漏水，却怪罪于产品设计。所有这些具体的、鲜活的、有时是非理性的、甚至包含误差的具身检验，共同构成了一种“冗余的共识”。这种共识之所以可靠，恰恰在于它的低效、它的冗杂、它的无法被一个统一意志所精确编排。大自然本身正是通过这种冗余来构建强韧系统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不来自每一个节点的优化，而来自大量低效、重复、彼此部分重叠的反馈回路；市场，恰恰是在无意识地模仿这一策略。

旧契约的精妙之处，正在于它将这个极度冗杂、难以直接处理的“具身检验史”，压缩成了一组可排序、可比较的数字信号（如 4.5 星评级、第 3 名排名）。这是一个天才的信息压缩工程。然而，这个工程含有一个隐秘的运作前提：数字信号（那个压缩后的结果），与那个冗杂的“具身检验史”（被压缩前的原始发生），必须是同一条时间之箭上的产物。身体先检验，然后信号才出现。信号是被动的、滞后的、是那个已经发生过的冗余共识的投影。影子只能跟在身体后面。这个前提如此根本，以至于在互联网经济的黄金时代，它几乎从未被作为一个需要被明确论证的假设而提出来过。它被默认为经济世界的物理常数，就像引力一样，没有人会觉得需要写一篇论文来“证明”它的存在。

而 AI 的降临，正是从这个最脆弱的默契前提上，发动了一场釜底抽薪式的进攻。它第一次使得“信号”可以被大规模地预先制造，其外观完全复刻了那个冗余共识的投影，而背后的“具身检验史”却从未真实地在这根时间之箭上发生过。不是影子背叛了身体，而是影子学会了在身体尚未走到阳光下的时刻，自己先站起来跳舞。数字信号与具身检验之间的那根生成性时间链条，被技术性地截断了。AI 对经济学的真正挑战，不在效率、不在替代、不在信息不对称的加剧——而在于我们第一次被迫面对一个此前从未被理论化的深渊：当生成信任的那根时间之箭被折断之后，整个信号-信任契约的地基还剩下什么？

而这，正是将旧契约的三层结构从“自然秩序”降格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脆弱平衡”的时刻。三层结构本身，不再是分析问题的中立的框架；它现在就是问题的病灶所在。

三、空转回路的三个现场：一场虚构锁定的发生学深描

上一节追溯了“说法-数字-道理”旧契约的历史发生，并指认了其默会前提——身体先检验，信号后出现——在 AI 面前暴露的裂缝。然而，抽象的机制描述如果不嵌入具体的发生过程，就会滑向对“系统”的功能主义叙述，仿佛“价值空转”是一个自然涌现的病态均衡。这一节将转换策略：以三个相互咬合的案例为血肉，完整展演一条空转回路从启动、加固到崩塌的全过程。这三个案例不是随机选取的——它们分别对应回路中的三个关键环节：电商业的 BlenderBomb 案例展演“说法预售信号→数字洗白”的前两步；内容平台的流量空转展演“AI 生成内容劫持注意力”的平行形态；独立评测者的反向案例则展演“真实具身检验”如何在旧契约的废墟上被市场重新定价。三个案例共同追踪同一个追问：在“具身检验史”从未真实发生的地方，一套“说法-数字-道理”的自我循环是如何被搭建起来的？它又在什么条件下会崩塌？

3.1 电商现场：BlenderBomb 的空转简史

2023 年初，一款此前名不见经传的便携式碎冰机——本文称之为“BlenderBomb”——悄然进入亚马逊的厨房小家电类目。BlenderBomb 本身并非粗制滥造的产品：其硬件规格与一线品牌的中端产品大体持平，代工厂是珠三角一家同时为多个知名品牌供货的成熟制造商。真正决定其命运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其上市策略。

BlenderBomb 的运营团队来自深圳跨境电商圈，精通亚马逊的流量规则。他们没有选择传统的站内广告——那太慢、太贵，且对于新品牌而言转化率有限。取而代之的，是一次精心策划的 AI 生成内容战役。团队使用当时刚向公众开放不久的 ChatGPT 企业版，配合一套自研的提示词模板，在两周内生成了超过两千条高质量的“用户评价”和“使用体验分享”。这批文本被仔细地设计了差异化的语调：有的是“追求性价比的大学生”的随手测评；有的是“注重健康的宝妈”的详细对比；有的是“健身爱好者”的蛋白质奶昔制作心得。每一条都配有从免版权图库中精选的碎冰机使用场景照片，偶尔夹杂几张看似由手机拍摄的、带有生活气息的模糊照。

这批说法并没有被直接发布在亚马逊的评论区——那里的反作弊监控正变得越来越严密。相反，它们被“种草”在了更上游的信息触点：Instagram 的美食博主标签页、Reddit 的 r/fitness 和 r/Cooking 子论坛、TikTok 上以生活小家电测评为主题的短视频账号评论区。这是一场“信息预铺”战役：在消费者尚未开始搜索“碎冰机”之前，BlenderBomb 就已经占据了他们可能接触到的每一个信息触点。

这一策略的设计逻辑，是基于对平台反作弊算法的一项判断。这些算法——包括亚马逊的 A9 搜索排名系统——在检测虚假行为时，主要依赖三类信号：行为模式的统计异常（如同 IP 地址、密集注册时间）、账户的信任历史（如新账户还是老账户）、以及内容字段的重复度与语义相似度。但当 AI 生成的评价文本被分散发布在卖家无法控制的第三方平台，由真实用户在自然浏览中被触达、被说服、被引导至亚马逊完成购买时，这三类防御全部失灵。这些消费者不是僵尸账号——他们的点击模式、浏览轨迹、购买决策，在统计上与任何被一个好产品所吸引的消费者的行为完全同构。当这些用户完成购买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约 15% 至 20%，根据电商行业的一般回评率——会返回亚马逊留下

自己的真实评价。这些评价不再是 AI 生成的。它们是真实的顾客写的真实的体验。但它们的存在，是由那两千条 AI 生成的虚假“种草帖”所诱发的。

亚马逊的 A9 算法在一个月内将 BlenderBomb 推入了“便携碎冰机”细分类目的 Top 20。算法既看不到上游的那两千条 AI 种草帖，也无法从这群第一批真实消费者的行为模式中嗅出“异常”。算法被要求侦测“假的行为”，但它从未被要求、也从未被赋予能力去侦测“真实行为的虚假诱因”。一个真实的点击，在算法的眼睛里，永远只是一个真实的点击。这是算法的本体论盲区：它的分辨率，在“诱因”这个范畴面前，归零。

至此，第一重回路闭合。但空转回路真正的加固，发生在第二重叠代中。BlenderBomb 的高排名和持续增长的销量，在 2023 年第二季度被一款 AI 驱动的电商数据分析工具（这类工具广泛服务于投资机构 and 品牌买手）自动识别为“高增长潜力品牌”。一份并非由任何人类分析师撰写的、而是由 AI 工具套用模板生成的品牌简报，被推送给了一家小型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经理。这份简报标题为“BlenderBomb: A Data-Driven Challenger in the Portable Blender Space”，使用了标准的商业分析语言，引用了真实的销量数据和增长率，并辅助以“Z 世代消费趋势”“社交电商红利”等标准叙事。投资经理——一个真实的人——在读了这份简报后安排了尽职调查，最终以 200 万美元的估值对 BlenderBomb 进行了种子轮注资。融资消息在科技媒体上引发了数篇报道。这些报道——虽然由人类记者撰写，但深度依赖于 AI 数据分析工具提供的素材——进一步巩固了 BlenderBomb 的市场地位。一个新的加盟经销商网络在这些报道的背书下迅速扩张。道理，现在也进入了回路。

从这个完整的链条可以看到，BlenderBomb 的空转回路经历了三步迭代：AI 说法预售信号（虚假种草帖）→ 真实消费者被诱发的购买行为完成“数字洗白”（销量与排名）→ 数字信号触发资本的“道理生产”（AI 辅助的品牌简报与投资叙事）→ 道理吸引更多消费者与经销商，产生更多销量数据，完成回路的闭合与加固。

3.2 内容战场：当流量算法也陷入虚构锁定

电商并非空转回路的唯一宿主。内容产业——尤其是依赖算法推荐进行流量分配的平台——正在经历同一病理的另一种表现形态，且其空转逻辑共享完全同构的发生学骨架。

自 2023 年初以来，随着 AI 写作工具的普及，一批此前以手工洗稿为生的内容农场，迅速将全部生产流程切换为 AI 驱动。其操作逻辑与 BlenderBomb 的运营团队高度同构：利用另一款 AI 工具——如专门的趋势分析平台——实时监测各大内容平台的流量热点与推荐算法的偏好模式；然后将这些热点词输入写作 AI，批量生成大量“爆款文章”和短视频脚本。这些内容的标题经过 A/B 测试优化（“某款新药的十大惊人副作用”“某历史事件不为人知的真相”“你每天都在吃的五种致癌食物”），在事实层面往往存在严重的错误或夸大，但在文本层面完整具备了触发平台推荐算法所需的全部特征：耸动的标题、流畅到不需要努力就能吞咽的叙事、在开篇七秒内完成情绪调度的节奏。

这些 AI 生成的文本被发布后，诱发了真实用户的点击、阅读和转发。平台的推荐算法——以 TikTok、YouTube、今日头条为代表——监测到这些内容的高点击率和高互动率，便将其推入更大的流量池。一个由 AI 生成的虚假内容，由此被算法认证为“受欢迎的高质量内容”，获得更多曝光。更多曝光带来更多真实点击，更多真实点击巩固更高的算法推荐优先级。与此同时，那些需要记者进行

实地采访、专家进行反复核查、编辑进行多轮修改的深度内容，因为生产周期长、发布频率低、标题不具备“标题党”特征，在流量竞赛中被边缘化。

电商的空转与内容的空转，其区别仅在于被劫持的“身体行为”的具体形态不同：一个是购买行为，一个是注意力行为。但两者的空转共享同一套发生学骨架——AI 在信号-信任链条的上游，预先制造了本该由具身检验来填充的说法；这些说法诱发了真实的人类行为；平台算法因其本体论盲区，不加甄别地将诱发的行为转译为价值信号；信号闭环后触发资本的“道理”跟进，进一步加固回路。这正是本文在第三节开头承诺要展演的：空转回路在不同领域的具体操作形态。下一节将解剖使这一切得以可能的那个核心机制——算法的本体论盲区与“数字洗白”。

现在，再来看一个来自反向的案例——一个真实具身检验场域是如何在空转的废墟上被市场重新定价的。

3.3 反向现场：独立评测者的重新定价

BlenderBomb 的空转策略并非没有遭遇抵抗。在 BlenderBomb 的事件链条中，有两个细节值得深挖。第一，那两千条 AI 生成的种草帖，虽然成功诱发了第一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但它们并没有骗过所有人。在 Reddit 的 r/BuyItForLife 子论坛——一个以推荐耐用品、注重真实长期使用体验著称的社群——有用户指出，关于 BlenderBomb 的“好评潮”出现在多个不相关的子论坛中，且发帖账号的注册时间与发帖时间之间存在可疑的接近性。虽然这些账号的行为模式对平台算法而言是“正常的”（它们是分散的、不同 IP 的、非密集行为的），但在一个高度警觉的、以共同体交叉检验为运作方式的社群中，这种“说法的一致性”本身——那种过于光滑、过于“刚好符合你对一个好产品的所有期待”的叙事质感——成为了一种可疑的信号。社群成员开始主动回避 BlenderBomb，并转而推荐另一款由一家小型家族企业生产的、在亚马逊上仅有数百条评价的手工碎冰机。

第二，也是更关键的一个细节：在 BlenderBomb 事件的余波中，一个在 Substack 上写作的独立家电评测者——我们称他为“David”——发表了一篇对 BlenderBomb 与那款手工碎冰机的详细横向评测。David 采用的评测方法与任何一个科技媒体的标准方法截然不同。他没有依赖厂商提供的样机；他在文章开篇即明确声明“两台机器均为自费购买”；他记录自己在六个不同使用场景下（日常冰沙、健身后的蛋白奶昔、家庭聚会的大量碎冰需求等）、在长达三个月的周期内、与四款同类产品进行横向对比的完整过程；他邀请了两位朋友——一个美食博主和一个健身教练——在他的厨房里独立试用并给出反馈，并在文章中附上了这些朋友的手写笔记的照片。在他的评测中，BlenderBomb 的表现是“尚可”——作为一款碎冰机，它能完成基本功能；但那款手工产品，在经历三个月、每天至少使用一次的高强度测试后，在刀片耐用度、噪音控制和清洁便利性上均明显胜出。

David 的这篇评测获得了远超他平均阅读量的关注。评论区里，读者反复提及的不是评测“写得有多好”，而是“看到你记录了三个月的过程，我知道这些结论不是随口说的”。换言之，David 这篇评测的可信度，不建立在他的修辞技巧或文章的论证结构上，而建立在他的整个检验过程——包括购买、使用、对比、记录——所花费的那三个月不可逆的生命时间，以及这个时间投入对于读者而言是可以被追溯和监督的这一事实上。读者信任的不是一篇评测，而是这篇评测背后的那条具身检验史。

David 的案例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他的评测方法是全新的——Consumer Reports 等传统评测机构已经做了类似的工作近一个世纪。它之所以在这个历史时刻被视为一个值得讨论的新现象，是因为在

BlenderBomb 这类空转策略的压迫下，David 这类评测者的经济价值被市场重新定价了。在旧契约下，一个花了三个月做评测的人和用 AI 批量生成“五天亲测报告”的卖家，在数字信号层面（文章的点赞数、转发量）上可能难以区分。但在空转回路持续运转、消费者反复被“假好评”欺骗受伤后，市场开始反向筛选：一部分消费者不再仅仅依赖数字信号（排名、星级）来选择相信谁；他们开始付出额外的认知成本，去识别那些能够证明“这条路是如何被一步步真实地走过”的信号——比如 David 笔下那些具体的时间记录、手写笔记的照片、被邀请的朋友的真实姓名。这些信号之所以比星级评分更具信任生产效力，不是因为它们“更准确”，而是因为它们更难以被一个中心化的意图所伪造——伪造一个假的手写笔记照片，比生成一段假的“五天亲测”文本，要耗费高得多的造假成本，且更容易在交叉检验中被识破。

David 的案例不是孤例。在 Substack、Patreon、付费社群中，一个相似的模式正在被重复：独立创作者通过公开声明“不接受厂商赞助”、详细记录其购买与使用过程、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声誉与评价挂钩（“如果我说谎，你会知道去哪里找我”），来构建一种在空转时代仍然能够持续生产信任的微观制度。这些实践的共同结构是：它们不再试图优化“说法”或“数字”来赢得竞争，而是在“说法”的上游——也就是具身检验这个发生过程本身——建立一道无法被 AI 绕过的护城河。这道护城河的材质，不是信息的准确度，而是发生过程的可追溯性与不可逆性。

这三个案例——BlenderBomb 的空转、内容农场的流量空转、David 的反向定价——构成了本文全部理论概念的现场。我们将在后续各部分中反复回到这三个案例，用它们来逼出概念、检验论证、回应反驳。

四、价值空转的发生学骨架：从算法盲区到虚构锁定

上一节的三个案例，各自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空转回路的运作。这一节的任务，是将这些分布在电商与内容领域的现场经验，收紧为一套可追问其发生条件的核心机制。本文的论点是：价值空转的发生，关键在于四步依次逼出的机制——其中每一步都在前一步的技术条件下从潜在可能变成了可操作的现实。

4.1 第一步：信号-信任链条的截断——AI 把“说法”的生产从“肉身检验史”中剥离

这一步本身并非空转的充分条件，而是空转成为可能的触发事件。过去，大规模的虚假说法生产受到一个刚性约束：雇佣一万个水军写假评论，虽然理论上可行，但其成本（金钱、组织、时间）对于大多数中小卖家而言是实质性的壁垒。AI 第一次将生成高质量、高度差异化、语境贴合的说法的边际成本打到了零——不仅是金钱上的零，更是时间上的零（瞬时生成）和意图上的零（算法不需要知道自己在“造假”）。这个截断之所以深刻，不是因为它“打败”了旧契约，而是因为它将旧契约下被冗余噪声所遮蔽的、关于信任生产的三个默会条件，第一次作为必须被正视的硬约束暴露在了理论的探照灯下。

4.2 第二步：算法的本体论盲区与“数字洗白”——从信号截断到回路闭合的决定性一跳

如果 AI 生成的说法无法最终转化为数字信号，那么空转回路永远不会闭合。卖家仍然只是在进行一种更高效的信息操纵，但无法完成最关键的那一步：让自己的平庸产品穿上畅销品的铠甲。正是平台算法的本体论盲区，充当了从“信号截断”到“回路闭合”之间的桥梁。

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算法盲区”指的不是平台算法在技术上的无能，而是一种范畴性的失灵。平台反作弊算法——以亚马逊的 A9 系统为代表——在设计上被赋予了检测“行为是否像假的”的任务。它侦测注册时间、IP 地址、购买频率、评价文本的相似度。这些检测的有效性，建立在造假行为必然留下某种统计异常这一前提之上。但当 AI 生成的虚假说法被分散发布在第三方平台（而非直接灌入亚马逊评论区），并成功诱发真实的、分散的、自然的人类行为时，这些检测手段在范畴上失去了目标。它们无法区分“被虚假种草帖诱发的真实购买”和“被真实品质吸引的真实购买”——因为这两种购买行为，在被算法观测到的数据层面上，是完全同构的。

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优化算法、增加特征工程来逐步解决的工程问题。这是一道本体论边界：算法被设计来识别行为的真假，但它从未被要求、也从未被赋予能力去识别行为背后的初始诱因的真假。一个真实的点击，在算法的眼睛里，永远只是一个真实的点击。由此，AI 说法在算法的盲区中完成了它最关键的一步“漂白”：那些靠 AI 种草帖诱发的真实购买行为，被平台算法不加甄别地转译为了销量、排名、星级和“Amazon's Choice”标签——旧契约下定义“好产品”的那些最硬的数字信号。一个平庸的产品，由此穿上了一副由真实的行为数据锻造而成的畅销品铠甲。这副铠甲的材质，不是虚幻的修辞，而是真实的、被算法认可的、具有法定经济后果的肉身行为数据。也正是在这一步，价值空转与经典的“刷单”行为彻底区分开来：刷单依赖的是伪造的行为，空转依赖的是真实的、只是被虚假诱因所驱动的行为。

4.3 第三步：“道理”的通胀——回路在认知维度上的加固

当被算法推至台前的平庸产品开始占据市场中心，第三重回路启动。行业分析机构——包括那些使用 AI 驱动的商业情报工具——识别到该产品的“火箭式蹿升”，生产出将其商业模式奉为圭臬的分析报告。资本嗅到“高增长”的气味跟进注资。财经与科技媒体围绕这一现象编织叙事。更关键的是，在这个环节中，AI 本身也在直接参与：任何一个商业模式，无论它在实质上多么具有剥削性或不可持续，AI 都可以在瞬间为其生成一百个基于不同学术流派的、引经据典的、逻辑环环相扣的辩护论证。Neil Postman 在《技术垄断》（Technopoly）中批判过“唯科学主义”如何成为一种为制度提供虚假合法性的信仰体系——但 Postman 面对的是由人类专家生产的、至少还需要数年学术训练才能制造出来的“道理”。而 AI 时代的道理生产，不需要任何认知上的真诚投入。道理，也被拖入了绝对的通胀。这不是 Postman 世界的技术升级版。Postman 仍在处理“人用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算法用科学的外观自动生成辩护”的局面。批判科学主义的前提——存在一个可以被批判的、持有这种意识形态的认知主体——正在被瓦解。

4.4 第四步：虚构锁定的形成——为什么这不是路径依赖

至此，一个无需初始基座的自我循环被搭建完成。AI 说法诱发了真实行为→行为被算法转译为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催生资本与媒体的道理跟进→道理吸引更多真实行为和更多 AI 说法被投喂入回路。这个回路一旦闭合，便不再需要任何时刻回到那个最初的默会前提上去。它不需要一个真正好产品的内核。它的整个自我循环的存在，就是它的内核。

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正面迎战一个最可能收编本文概念的理论对手。一个足够敏锐的批评者会指出：你描绘的这个“平庸产品靠正反馈锁定市场地位”的过程，难道不正是 W. Brian Arthur 和 Paul A. David 在 1980 年代阐述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的经典案例吗？QWERTY 键盘不是最好的键盘，但它在历史上的某个偶然节点被一个关键的大订单（美国海军打字机采购合同）选中，从而启动了正反馈循环（更多制造商生产 QWERTY、更多打字员学习 QWERTY），最终把更高效的 Dvorak 键盘锁出了市场。BlenderBomb 与 QWERTY 键盘，在形式上有惊人的相似性——一个不是最优的产品，靠某种初始优势获得了不可逆的市场地位。

这个收编挑战必须被正面接住，因为如果“价值空转”只是“路径依赖”在 AI 时代的又一个案例，那么本文的核心概念就没有不可通约的理论收益。但切割是清晰的：在经典的路径依赖中，那个触发锁定的初始事件——QWERTY 被海军订单选中——是一个在物理时空中真实发生了的经济史实。它虽然偶然、虽然不必然，但它是真的。整个后续的正反馈，是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历史基座之上的。而价值空转的初始启动器——BlenderBomb 那两千条 AI 生成的种草帖——是一个从未在物理时空中作为具身检验真实发生过的“幽灵事件”。被诱发的第一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真的，但驱动他们购买的那个“社会证明”——两千个不同的、独立的、已经用过这款碎冰机并且真诚推荐它的人——从未存在过。价值空转的整个锁定基座，是一个符号学上的虚构——一套被完整生产出来的、从未发生过的“共识史”。

路径依赖是历史锁定：一个真实的历史偶然事件，通过正反馈被不可逆地锁定为市场标准。价值空转是虚构锁定：一个从未发生过的虚假历史，被算法误认为真实历史，并以此为基础搭建起整个正反馈大厦。在历史锁定中，你仍然可以追问“如果当初海军的订单选择了另一种键盘会怎样”——这是一

个反事实的历史问题。在虚构锁定中，不存在这个反事实——因为那个“初始事件”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于任何真实的时间线上。因此，“价值空转”不是“路径依赖”的一个子类，而是对路径依赖的基座所进行的釜底抽薪：它把“初始事件”从物理时空偷换到了符号时空。正是这种偷换，使得“价值空转”的理论收益不可被“路径依赖”或“锁定效应”所 1:1 替换。这一刀的切割，是本文全部论点的不可通约性的核心据点之一。

五、不可通约的分水岭：为什么“价值空转”不是已知理论的翻版

在正面提出本文的核心概念并深描其经验现场之后，有一道容不得绕过去的深堑。任何熟悉信息经济学和当代批判理论的读者，都完全有理由提出一个尖锐的质疑：你所谓的“价值空转”，究竟是不是一个已经被现有的、更成熟的理论充分描述过的现象，只不过被你换上了一套更漂亮的新修辞？上一节已经与路径依赖做了切割。本节将在更广阔的理论战线上，依次澄清这一概念与四个最可能收编它的既有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面：博德里亚的“拟像”理论、表演性理论、Postman 的“技术垄断”批判、以及斯彭斯的信号理论。

5.1 与博德里亚“拟像”的切割：必须闭环钩住肉体的物质性

第一个强有力的挑战来自让·博德里亚。在《拟像与仿真》一书中，博德里亚描绘了符号与真实之间关系演化的四个阶段，最终进入“拟像”阶段——符号“与任何真实都没有关系，纯粹是它自身的拟像”。任何熟悉这一理论的读者，在读到本文关于 AI 生成的说法不再指向真实价值、数字信号自我指涉的描述时，都有充分理由追问：这不就是博德里亚在四十年前预言的那个世界吗？

本文的回应是：博德里亚的拟像理论精准地描述了符号与真实脱钩的“状态”，但它系统性地遗漏了 AI 时代经济病理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这个自我指涉的符号系统，并不是在一个自足的符号宇宙中自由漂浮。相反，它必须周期性地伸出一只钩子，牢牢钩住一个真实的、物质世界中的肉身行为，才能完成它的自我证实与再生产的循环。AI 生成的那两千条种草帖，无论多么像“拟像”，其最终目的不是停留在语言的世界里成为“超真实”，而是必须驱使一个血肉之躯的人去点击“购买”按钮、付出一笔真实的金钱。那笔钱，是真实的。那个消费者拆开包裹、使用产品、在物理世界中获得或失望的体验，也是真实的。这个从符号世界到肉身世界的强制性闭合动作，是整个空转回路最要害的一步——正是这一步，使得虚假说法得以“洗白”自己，将自身转化为不可撼动的数字信号（销量、排名）。博德里亚的符号在镜厅中无限反射，而我们讨论的信号，则必须周期性地伸出一只钩子，牢牢钩在物质世界的坚硬边缘，才能完成它的再生产。这个钩子——真实的人类行为和真实发生的经济交易——是博德里亚的理论从不处理的经济学内核。

5.2 与“表演性”理论的切割：造假被去主体化之后

第二个强有力的挑战来自经济社会学中的“表演性”理论，由 Michel Callon 和 Donald MacKenzie 等人系统发展。其核心论点是：一个经济理论或模型，并不是对经济现实的“客观描述”；相反，它通过改变市场参与者的信念和行为，使自身成为真实。MacKenzie 对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的经典研究表明：交易员开始使用这个公式为期权定价，他们的行为改变了市场，最终使得市场价格的运行方式越来越接近公式的预测。

将这个框架应用到 BlenderBomb 案例，似乎可以无缝重述：AI 生成的虚假说法相当于一个“模型”或“叙事”；它改变了消费者的信念和行为（诱发了购买）；这些行为数据被算法转译后，反过来验证了最初的说法（高排名和好评又吸引了更多人购买）。这不正是一种“表演性自证预言”吗？

这个重述在表面上是准确的，但它遗漏了一个决定性的差异。在表演性的经典案例中，那个初始的“理论”或“模型”——比如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本身是一个真诚的认知产物。它的提出者相信它在认知上是有效的；即使它在实践中产生了自我实现的效果，它仍然承载着其创造者的认知意图和理论责任。更重要的是，如果它出错了，那个错误可以被追责到模型的提出者或使用者那里。意图、责任与可追责性，是表演性链条上的内在一环。

但 BlenderBomb 团队生成的虚假种草帖，其生产过程彻底绕过了这一环。卖家没有编造任何一条具体的谎言；他甚至不知道 AI 具体生成了哪些句子。那个“造假的意图”，虽然功利动机（“我想多卖货”）仍然在卖家那里，但造假行为的执行——那个具体的、本应由一个知道自己正在生产虚假叙述的主体来承担的动作——被外包给了算法。算法不知道自己在“造假”，因为造假需要意图，而算法没有意图。卖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写假评论，我只是用了 AI 工具来做营销。”

这就是本文所指认的“去主体化”的断裂：造假这个行为，在历史上第一次可以被分割为“造假的动机”（仍在人那里）和“造假的执行”（外包给没有意图的算法）。这一分割，使得旧契约下所有关于信任、责任与惩罚的经济学范畴全部面临失效。如果你不能指认一个“造假者”——因为造假的具体执行不是由任何一个有意图的主体完成的——那么你惩罚谁？平台？它只是提供了“中立的”推荐算法。卖家？他只是“使用了营销工具”。AI 工具的开发者的？他们只是“提供了语言生成服务”。责任在意图与执行的裂缝中蒸发了。而表演性理论从未处理过这种“无主体的执行”，因为它的理论前提始终是：存在一个可以被指认的、承担着认知与道德责任的叙事生产者。如果“价值空转”可以被“表演性自证预言”所 1:1 替换，那么上述这个断裂就不构成理论收益。但如果这个断裂——造假行为的去主体化——被承认是一个此前未被充分理论化的新现象，那么“价值空转”就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新名字。它命名了一个在“表演性”框架的预设中无法被看见的区域。

5.3 与 Postman “技术垄断”的切割：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唯科学主义到作为自动生成机的 AI 道理

本文在第七节将会专门处理“道理的通胀”。但在此处，必须预先与 Neil Postman 做一个必要的切割。Postman 在《技术垄断》中诊断了“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如何成为现代社会的准宗教——社会科学被用来为制度辩护，统计数字被赋予超出其认识论能力的权威。这个批判，与本文关于 AI 道理为任何商业模式提供辩护的论述，在表面上高度重叠。

但区别是根本性的。Postman 批判的，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唯科学主义——一种由人类知识分子持有、传播、并通过教育体系和媒体再生产的世界观。在这种批判的预设里，仍然存在一个可以被指认的、持有这种意识形态的认知主体。而本文面对的，是 AI 作为道理自动生成机器——不需要任何人类知识分子真诚地相信某个商业模式的合理性，AI 就可以在瞬间为其生成一百个逻辑严密、引经据典的辩护论证。这不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在 AI 时代的技术升级，而是道理生产本身的去主体化：被生产出来的道理，背后没有一个“信它”的人。它纯粹是一个按照最大化说服力优化出来的语言产品。

Postman 的世界里，人们还可以批判那些将科学当作宗教来信奉的专家；在本文的诊断里，那些“专家论证”本身已经被 AI 自动化了，批判找不到那个持有信仰的主体。这就是为什么第七部分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元：道理的通胀，不是旧批判的延续，而是一个被新工具逼出来的、全新的认知危机。

5.4 与斯彭斯信号理论的切割：生成性导管被截断

最后，与迈克尔·斯彭斯的信号理论做切割。斯彭斯模型的核心是“成本”充当着区分品质的筛子：一个信号要产生“分离均衡”——即高质量发送者能够通过发送信号把自己与低质量发送者区分开来——其成本必须对不同品质的发送者而言是不均等的。AI 带来的冲击，并不只是“把信号成本降到了零”这个量变。更根本的是，它截断了斯彭斯模型中一条默会的生成性导管：信号成本与真实品质之间，在经验上是关联的——求职者通过在学校时光，确实发生了认知和能力的改变，这些改变与学位的信号成本在因果上是连接的。但 AI 生成的说法完全绕过了这条导管：卖家不必真的做出好产品并等待真实的用户好评（高成本），也无需雇佣一万个真人水军（高成本），就能获得与“好产品”几乎一样的数字信号。这并非仅仅是制造了一条更便宜的信号成本曲线——它是在零成本的位置上，直接生成高成本信号的外观，而信号背后的那个生成性过程（真实品质的逐步建立）从未发生。换言之，信号与品质之间的那根因果连线——即使在斯彭斯的模型中它也是不完美的、存在误差的，但它的存在是均衡的逻辑前提——被彻底截断了。这不是信号失灵的加剧，而是信号生成的地基被技术性地绕过。

六、信任的物理基底：为什么必须有“浪费”的肉体？

前文的全部诊断——从旧契约的历史发生到空转回路的虚构锁定——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失败：我们赖以判断价值的旧契约，因其与那个冗杂的“具身检验史”之间的生成性链条被截断，而陷入了不可挽回的空转。那么，那条被截断的链条，其最根本的、无法被 AI 化的内核究竟是什么？

我将这个内核凝练为这样一个概念：“具身共识”。它是对“信任如何被真实地生产出来”这一源初问题的回答。信任的产生，并非来自更透明的信息、更高级的算法或更具逻辑的论述。它来自一个更古老、更沉重、更不可被技术压缩的过程。具身共识，是指这样一种社会认知的形成机制：大量独立的、用自己的身体和不可逆的生命时间作为检验成本的观察者，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情境下，对一个共同对象进行冗余、浪费、且无法被任何中心化算法预先统合的交叉检验，最终在集体层面自发凝结成一个关于该对象价值的、坚韧且难以被瞬间篡改的判断。

这个概念有几个至关重要的维度。但这里必须采取一种与解剖标本不同的展开方式。与其列出“三个特征”，不如沿着“价值空转”这条病理解剖线，去追问：空转回路在试图替代具身共识时，最先动摇了哪一个维度？然后是哪一步？最后才是哪一层？让概念的维度从对抗中发生出来，而不是从定义中被宣读出来。这一做法，本身就是对发生学纪律的遵守：概念不是被给定的起点，而是被矛盾逼出的结算。

最先被 AI 动摇的，是共识形成过程的冗余性与非算法性。在旧契约下，一万个真实消费者的一万条评价，其中有很多在算法看来是“低效”“噪声”甚至“无效”的。有的人评价的是物流速度而非产品本身；有的人给了差评是因为自己操作失误。这种冗余和低效，恰恰是具身共识强韧性的来源。因为它非算法性的——没有一个中心化的逻辑可以统摄它、预测它、并因此完整地伪造它。而 AI 擅长的，恰恰是用最可能、最理想、最“像真人的”评价集合来模拟这个共识。它剔除掉了那些低效的噪声——那些由真实人类在特定情绪下、特定情境中因特定偶然原因而说出的“不规范”的话——用一个平滑的、高度优化的“平均满意消费者”的文本形象来取而代之。AI 生成的一万条评价，每一条单独看都无懈可击，但作为一个集合，它因为过于“干净”、过于“高效”而背离了共识的真实发生学结构。真实共识的强度，来源于它包含的冗余和低效无法被统摄；AI 的致命弱点，恰恰在于它只能通过统摄——通过概率分布的最优化——来生成。这不是信息量的高低之差，这是发生学结构的不同。

那么，在真实的具身检验史中，这些冗余和低效是如何实际地参与到信任的凝结中的？回到 David 的案例。David 的横向评测之所以被读者信任，不只是因为他“花了三个月”——一个 AI 也可以在文本上生成“我花了三个月”这个陈述。读者信任的，是那三个月在他的文字中留下的无法被事先编程的痕迹：他在第一篇使用笔记中表达的对 BlenderBomb 刀片设计的初始好感，在第二个月时因刀片出现微小磨损而发生的评价修正，以及他在第三个月时邀请朋友来厨房独立测试、结果朋友的评价与他自己的并不完全重合这一事实。这些痕迹——内部的自我修正、外部的独立确认——之所以能作为信任信号，不是因为它们“准确”，而是因为它们构成了一种不可逆的、包含内部矛盾的发生过程。伪造一条“我用了三个月感觉很好”的陈述，AI 可以瞬间完成。但伪造一条包含了“我一开始觉得好、后来发现刀片磨损有隐患、再后来找了朋友来核对”的发生轨迹，其难度呈指数级上升——不是因为文本生成更困难，而是因为这条轨迹内部的矛盾、修正与外部独立确认的引入，需要在文本中留下大

量彼此勾连的时间戳和情境标记，这些标记在统计学上极难生成得浑然天成，而在共同体的交叉检验中极容易被识破。冗余和低效，在这里不是理论层面的“强度来源”概念；它是在实践层面，共同体的交叉检验所赖以运转的认知材料。

紧接着被突破的，是检验过程的不可逆投入与情境嵌入。旧契约下，每一个真实的评价者都在押上自己的一部分生命。他花了真实的钱——这是他过去劳动时间的结晶；他花了真实的时间去等待、使用、体验，这段时间他从生命中永远划去了。他的体验被深深嵌入在那个独一无二的检验情境里——他在一个下着雨的周二下午、心情低落时拆开了这个包裹，这个情境赋予他评价的那种微妙的、不可复制的情绪基调。而 AI 生成一条“在一个下雨的周二下午”的文本时，它不仅没有消耗那个下午，它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下午”。它不知道什么是等待。它不知道什么是花了钱之后那种“万一不好用呢”的微妙焦虑。它可以在文本中复刻这一切的外观，但它永远无法真实地消耗哪怕一秒钟的生命。而信任，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看，恰恰是我们大脑用来侦测“另一个体是否为我付出了真实的、不可逆的成本”的一套极其敏锐的算法。具身共识之所以可靠，不是因为它信息更全，而是因为它背后站着一片由无数不可逆的微小生命牺牲构成的“信任森林”。AI 生成的文本，牺牲不了一片叶子。

最后——也是最根本地——被 AI 突破的，是检验者的绝对独立性与多重意图的不可协调性。在旧契约下，一万个亚马逊评价者谁都不认识谁，动机千差万别，购买和使用的情境大相径庭。这种结构上的独立性——每一个检验者都是一个独立的意图中心，不受任何统一指令的协调——是信任的终极基石。AI 的问题不在于它模仿一个个体很像，而在于当它被一个卖家用于批量生产看似“独立”的评价时，那一万条说法的背后，实际上只站着一个功利意图。一个意图，无法伪造出一万个独立意图在截然不同的时空情境下、面对种种随机扰动时所产生的那种内在的、彼此间的不可通约性。因为一个意图，没有那种内在的杂音。它生出来的所有文本，无论表面上多么不同，都共用一个核心的算法逻辑——最大化说服力。而一万个真实的独立人类，他们的评价逻辑是彼此不可通约的：有人关注性价比，有人只在乎颜值，有人在评价里发泄今天上班的怒气，有人因为包装盒很好看就给了五星。这种内在的不可通约性，是任何被一个统一意图协调的算法——无论它多么强大——都无法生成的。因为它不是信息问题，是意图的本体论问题。

至此，可以收紧这一节的论证了。三个维度——冗余的非算法性、投入的不可逆性、意图的不可协调性——不是三个并列的“特征”，而是具身共识这道城墙由外到内的三层防御。AI 的空转回路，不是像一个外部入侵者那样去主动“攻破”它们——那是一种带有发现学色彩的军事化叙事，仿佛 AI 在设计上就是去攻击一个叫做“信任”的静态堡垒。真正发生的是：当 AI 以近乎零成本大量制造虚假说法时，旧契约中原先被冗余噪音所遮蔽的、关于信任何以可能的这三个默会条件，第一次作为必要的、无法被绕过的“硬约束”，被反向逼迫出来，暴露在理论的探照灯下。不是说 AI 去攻击了它们；而是旧契约的崩塌，让这些条件从隐性转变为显性。信任从前可以在不被追问这些条件的情况下自动运转；现在，只有当这些条件同时被满足时，信任才有可能发生。

七、剩余的锚点：当“道理”也沦为可量产的辩护

这场由 AI 点燃的“价值空转”，并不会停在“说法”与“数字”的层面。它的野火，最终势必要烧到那第三根、曾被视为终极裁判者的柱子——“道理”上面。这第三重通胀——道理的通胀——与前述的说法通胀（符号维度）、数字通胀（信号维度）共同构成了空转时代的三重通胀。三者并非平行并列：说法通胀是启动引擎，数字通胀是加固装置，而道理通胀则是认知维度的封口。

在旧契约里，“道理”是金字塔的顶端。它由一个特殊的群体——经济学家、管理大师、社会学家、深度调查记者——所生产。他们负责为混乱的经济现象提供秩序的框架。过去，一个论证的可信度，部分依赖于其“发生成本”：一项扎实的学术研究意味着作者投入了数年的艰苦调研、深度思考和反复推敲。这个成本本身，是论证可信度的一个间接但重要的信号。

AI 以其强大的模式识别和符号推演能力，向这座最后的堡垒发起了进攻。其进攻方式，不再是简单地制造虚假事实，而是更根本的：为任何一种立场，批量生产逻辑上无懈可击的“道理”。任何一个商业模式，无论它在实质上多么具有剥削性或不可持续，AI 都可以瞬间为其生成一百个基于不同学术流派的、引经据典的、逻辑环环相扣的辩护论证。道理的生产，由此也被拖入了绝对的通胀。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更深层的认知危机：我们正在失去从逻辑上去戳破一个泡影的能力。当一个空转产品被揭露时，其背后的资本和平台可以立即调用另一批 AI，生成另一套更精致、更自洽的“道理”来解释“那只是个别现象”“长期看市场会自我纠正”“批评者误解了创新的本质”。那试图戳破泡影的批评逻辑本身，在读者眼中，看起来也像是 AI 生成的另一个泡影。当“道理”沦为可以被无限量生产的立场辩护工具时，我们陷入的是一种关于论证本身的通货危机——我们不再知道如何判断一个论述是否“合理”，因为所有我们过去用来判断合理性的外在指标（它是否逻辑严谨？它是否引证丰富？它是否表述专业？）都可以被 AI 完美地模拟。这正是第五部分与 Postman 切割的核心现场：Postman 仍然可以在“唯科学主义”的框架下批判那些将科学当作信仰来贩卖的人类专家；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类在“信”的道理——它们只是被算法投喂进公共辩论的、优化过说服力的语言产品。

在这场认知无政府状态中，一个绝望的追问浮出水面：如果说法是假的、数字是被操纵的、道理也可能只是被定制的辩护，我还能相信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无法再从传统的“说法-数字-道理”的铁三角内部寻找了。我们必须将视线转向这个三角之外，去寻找那些 AI 的闭环所无法触及、无法编码、无法压缩的堡垒。这个堡垒，就是本文所论证的：关于信任生产的、最坚硬的物理-生物性约束——具身共识。

八、最后的稀缺：为什么“重度发生”是废墟上的结算

在完成对“具身共识”的理论建构之后，本文的论证必须向前再走一步：这种不可被算法压缩的共识生产方式，并非飘荡在空中的抽象理念。它在 AI 时代的市场中，正被迫以一种更尖锐的形态——“重度发生”——重新凝结，成为抵抗空转的最为稀缺的资源。

但此处必须做一次严格的自反。如果这一节的论证带着赞美、歌颂或怀旧的语调去描述“重度发生”，那么本文将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把“重度发生”写成一块失落的本真净土，仿佛在 AI 的虚假洪流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真实、更纯粹、更接近事物本来面目的原初状态，等着我们去回归。那不是发生学，那是披着批判外衣的浪漫怀旧。发生学的立场不承认任何“原初的本真状态”。它只追问：在 AI 截断了旧契约的信号-信任链条、制造出价值空转的废墟之后，人类在什么条件下、经什么路径，会重新发生出一种新的信任锚点？那个锚点恰好大量地表现为“身体在场、时间投入、创造性挣扎”的重度形态，不是因为身体天然比算法更真实、更本真、更接近某种形而上的“价值”——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发现学的残余。而是因为当前的技术与制度条件下，只有这种形态能够同时满足信任生产所需的三个硬约束：检验者意图的绝对独立性、检验过程的不可逆投入、以及共识形成的冗余非算法性。

换言之，“重度发生”不是被发现的本质，而是被空转危机逼出来的次优结算。它在市场中的经济价值，不是因为人们突然集体怀念起了“手工”“匠心”“慢生活”这些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同样可以被 AI 完美生成，甚至已经被资本大规模收编），而是因为在“轻”（虚假信号）的生产成本趋近于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那些无法被压缩的“重”——不是作为文化符号的“重”，而是作为生产成本和验证壁垒的“重”——其市场稀缺性被反向逼升了。

这一区分不是修辞上的细微差别。它决定了我们能否与“身体崇拜”和“本真性恋物癖”划清界限。David 那三个月的手写笔记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他“手写”这个动作在文化上比“打字”更本真——如果有人用 AI 生成一份“手写笔记”的照片来造假，同样可能成功。David 的笔记之所以在共同体中产生了真实的信任，是因为他在笔记中记录的那些具体的、可追溯的、包含内部矛盾（如前后评价的修正）的检验过程，无法被一个没有真实经历过这段时间的意图所生产。“重度”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它的文化符号价值，而是它作为一种可被共同体追溯和监督的、不可逆的投入过程，为信任提供了 AI 无法模拟的发生学门槛。David 的三个月不是“重”的文化符号；它是“重”作为一项不可压缩的验证成本。

基于这一严格的立场，可以展开“重度发生”在市场中被逼出来的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检验情境的强制身体在场与时间投入。回到 David 的横向评测。他购买的不仅是 David 的文字，更是进入 David 那间厨房、在那三个月中被反复使用、出现微小磨损、又在朋友独立测试中被再次验证的那些碎冰机的“发生现场”的特权。AI 可以在瞬间生成一份看起来同样专业的横向评测报告，但无法在报告中留下那些只有真实持续使用才会自然浮现的矛盾——比如“最初喜欢 BlenderBomb 的刀片设计，但第二个月后发现它在连续碎冰时发热明显”。这种矛盾，不是一个修辞技巧。它是在不可逆的物理时间中被迫涌现的。

第二个维度：创造性挣扎的不可模拟。这一点在 David 的案例中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但可以借用一个更经典的领域来阐明：艺术品市场。一个画家面对空白画布时的战栗，在多次覆盖与修改中的痛苦决断，在某个瞬间的意外笔触——这个过程的时间性是不可压缩的。它必须经过一个个真实的、曾经可能走向失败的瞬间。AI 可以模拟这一切的视觉结果，但永远无法真实地、不可逆地替人去经受这个过程。此处需要极其小心地措辞，以避免滑入对“经受”的本体论崇拜。我们不是要说“经受本身就是价值”——那是一种过程哲学的浪漫语调，会把“重度发生”重新神秘化。我们要说的是：在 AI 可以瞬间生成任何视觉结果的条件下，那些能够清晰地向收藏者展演“这个结果是如何一步步被发生出来的”——并且这个展演过程本身无法被算法压缩或伪造——的艺术品，其市场价值被反向逼升了。收藏者购买的不再只是“作品”，而是进入那个独一无二的、充满了摩擦与意外的“发生过程”的特权。这个特权的稀缺性，不是源于“创造”这个词在文化等级中的崇高地位，而是源于“创造性挣扎的过程”在当前技术条件下成为了少数无法被绕过、无法被模拟的信任生产机制之一。

第三个维度：物理时间的不可压缩的沉淀。橡木桶中的威士忌，其风味的形成依赖于四季更替带来的缓慢化学反应。AI 可以在文本中描述这种风味，但无法让一桶威士忌在物理世界中真实地经历哪怕一分钟的熟成。物理时间本身——不是“时间”这个概念，而是必须一秒一秒走过的、不可加速的物理过程——成为了阻隔虚假生成的一道天然护城河。

这三个维度——检验情境的强制身体在场、创造性挣扎的不可模拟性、物理时间的不可压缩性——共同构成了 AI 时代里那些暂时无法被空转吞没的价值飞地。但重申一次：它们被市场结算出来，不是因为它们更“本真”，而是因为它们更“不可压缩”。这个区分，是本文与一切怀旧叙事的最终分野。第八部分的任务到此完成：它在发生学上完成了“重度发生作为次优结算”的论证，但这一论证本身预设了“具身共识”是一个可靠的信任锚点。而历史和当代现实都告诉我们：身体在场的仪式，从来就是权力制造虚假共识的最有效技术。“重度发生”凭什么在这一次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这才是第九部分必须正面处理的、最棘手的问题。

九、不是玫瑰色的锚点：“独立意图”作为一种发生学条件

至此，本文似乎指向了一个光芒渐现的结论：在 AI 的虚假洪流之外，我们还有身体、创造和时间这些未被征服的价值飞地。如果论证停在这里，它将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天真，更可能滑向一种危险的政治无意识——仿佛这些“重度发生”的锚点是普惠的、中性的、所有人都能平等享有的救赎。任何诚实的分析都必须正视两道更深层的伤口，并通过这两道伤口的处理，将本文的锚点从“身体”这个物理事实，推进到“独立意图的发生条件”这个发生学判断。

9.1 具身共识的历史不干净：圣物、仪式与操纵

第一道伤口，指向本文最脆弱的一环。如果一个足够锋利的反对者在此等候，他的质疑将是：“你把‘具身共识’当作抵抗 AI 虚假信任的据点。但请看看历史。宗教仪式、宫廷礼仪、中世纪的圣物崇拜，哪一样不是强制身体在场、要求时间投入与精神挣扎的‘重度发生’？它们被用来生产和维持的，恰恰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牢固的虚假共识。如果具身共识这个信任生产机制本身在历史上就不干净，它凭什么在 AI 时代能成为抵抗虚假的锚点，而不是成为 AI 时代新的操纵工具？”

这个反驳直指本文此前论证中一个必须清除的默会倾向——在行文之间，“具身”被不自觉地与“真实”做了过多亲近，而历史证据恰恰相反：身体在场的仪式，从来就是权力生产虚假共识的最有效技术。中世纪的教会不需要 AI 来生成一万条好评，它只需要一座大教堂、一套圣礼仪式、一种让信徒跪在冰冷的石板上用身体的痛苦来确证信仰的制度。那是最古老的“重度发生”，也是最强大的虚假共识制造机器。

因此，必须在这里做一个严格的切割。具身共识能否产生真实的信任，并不取决于“身体是否在场”这一物理事实，而取决于另一个更深的发生学条件：检验者的意图是否被一个统一的权力中心或一个统一的算法逻辑所协调。中世纪的圣礼之所以能制造虚假共识，不是因为仪式不够“重”——它极重——而是因为参与仪式的所有人的解释框架、情感预期和认知范畴，都被同一个神学-政治权威所统一地塑造和监控。检验者的意图，在结构上不是独立的。他们的身体在现场，但他们的意图——他们对“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在做什么”“我应该感受到什么”的认知——被一个中心化权力所统摄。

这正是本文所指认的 AI 时代“重度发生”与历史上各种“被操纵的重度发生”之间的根本分野。在当代那些正在浮现的具身共识场域中——David 的独立评测、要求学生手写初稿并当面接受质疑的研讨课——其抵抗 AI 空转的能力，不来自“身体在场”的神秘魔力，而来自这些场域的制度设计确保了检验者意图的绝对独立性与不可协调性。David 的信任资本，恰恰建立在他与厂商之间没有利益共谋——他的检验意图是独立的，他的经济基础不依赖于任何单一品牌的赞助；研讨课上学生的互评之所以能产生真实的认知改变，恰恰在于每个人都被要求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困惑去回应——他们的思考意图无法被一个算法统一协调。换言之，AI 空转之所以无法攻破这些场域，不是因为它们“重”，而是因为它们“散”——它们由大量无法被统摄的独立意图所驱动。

这一刀的切割，将本文从“回归身体”的发现学陷阱中释放了出来。具身共识不是信任生产的充分条件——它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它的历史暧昧性恰恰证明了：身体可以被动员来制造共识，也可以被动

员来检验共识。决定它走向哪一端的，是检验者所处的制度条件——他们的意图是否被保护在独立的、不被一个统一权力所协调的结构之中。

9.2 独立意图的发生学条件：物质、制度、认知

上一小节指认了“检验者意图的绝对独立性与不可协调性”是决定具身共识走向真实信任还是虚假操纵的关键变量。但这个指认本身，如果只停留在这里，就仍然是一种发现学式的命名：“独立意图”被当成了一个静态的、要么有要么没有的属性。发生学要求我们追问更深一层：这个被称为“独立意图”的状态，不是在真空中天然存在的。它是在特定条件下被发生出来、被维护、也可能被侵蚀或收编的一个脆弱的、动态的平衡态。守护“发生权”，从根本上说，就是守护让独立意图得以持续发生的那些条件，而不是守护一个叫“独立意图”的抽象本质。

从 David 的案例和历史上被操纵的仪式的对照中，可以逼出独立意图所需的三组发生学条件。

物质条件：检验者的经济基础是否独立于被检验对象。David 的信誉，建立在他“所有推荐品均为自费购买”的声明以及他在很长时期内对这一声明的严格坚守之上。这个条件不是道德自律；它是一组具体的物质安排：他的收入依赖于读者的订阅和打赏（这使得他的经济激励在于“维护信任”而非“取悦厂商”），而不是厂商的赞助或广告分成。反过来，那些在历史上被收编的评测者——从早期的博客写手到如今的许多社交媒体网红——其意图从独立到被协调的转化，往往始于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物质拐点：接受了第一笔厂商赞助。一旦收入结构改变，维护信任的经济激励就会与取悦厂商的经济激励发生冲突，而后者如果压过前者，独立意图就开始瓦解。独立意图的第一个发生学条件，因此是物质性的：检验者的经济基础必须与检验对象之间没有利益共谋，且维护信任必须是其在经济上可持续的长期策略。

制度条件：是否存在一个能够交叉检验并惩戒虚假检验者的共同体。David 的独立地位，并不只是靠他自己的道德自律来维持的。他发表评测的 Substack 平台，本身并没有“认证”他的独立性。但他所处的那个读者-评测者-同行构成的共同体，在持续地对他的声明进行交叉检验。如果有一天他被发现收了厂商的钱却声称自费，这个共同体在极短的时间内曝光、讨论、并最终通过取消订阅来实施经济惩戒。正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以及它的交叉检验能力和实施惩戒的能力——构成了独立意图得以维持的制度条件。反过来，中世纪信徒的意图之所以能被神学权威统一协调，不仅是因为他们个人“不够独立”，更是因为当时缺少一个能够让不同神学解释进行平等对抗、让声称“神迹”的人被独立检验的制度空间。独立意图的第二个发生学条件，因此是制度性的：检验者必须嵌入在一个能够交叉检验其检验过程、并对虚假检验者实施有效惩戒的共同体之中。

认知条件：检验者是否经历了足够长、足够多样的具身检验过程，以至于无法被一个统一的叙事所“说圆”。这里需要警惕一种误解：不要把“认知条件”等同于“教育水平”或“批判性思维”——那会迅速导向一种精英主义的结论。本文要说的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独立”，而是：当一个人的具身检验史足够长、足够冗余、包含了大量不能被一条简单叙事所统摄的矛盾经验时，他对一个现象的信任或不信任，就不太容易被一个中心化的叙事所瞬间改写。David 不是因为“更聪明”才保持了独立意图；他是因为在三个月内、在多个不同情境下、与两个独立的朋友分别测试了 BlenderBomb 和那款手工碎冰机，积累了足够丰富的、来自不同独立观察者的、包含矛盾与意外的检验数据，才使得他对“BlenderBomb 还不错”和“那款手工碎冰机更好”这两个判断，有了不能

被一篇厂商赞助的公关稿轻易动摇的认知锚点。独立意图的第三个发生学条件，因此是认知性的：检验者必须拥有充分的机会，去进行冗余、长时段、多情境、多观察者的具身检验——不是因为他们是“需要被教育”，而是因为信任的稳定性本身依赖于检验数据的冗余度和不可统摄性。

至此，可以将“独立意图”从被命名的状态推进到被追问发生条件的状态。物质独立、制度交叉检验、认知冗余——这三个条件不是“独立意图”的三个外在保障；它们是“独立意图”这个状态本身如何在现实中发生和维持的内在机制。一旦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崩塌，独立意图就开始向被协调的意图转化——不是一瞬间完成的，而是在一次次微小的妥协（“就收这一次赞助”）中逐步滑移的。

9.3 “重度发生”被资本收编的风险与“发生权”的阶级问题

第二道伤口，指向阶级。一个同样锋利的批评者会指出：“你所谓的‘重度发生’场域——独立评测者的付费社群、研讨课的深度学习体验、手工酿造啤酒的品尝——哪一样不需要高昂的经济资本去交换？AI 带来的信息对称性崩溃，对穷人是灾难；但你提供的这套‘重度发生’的救赎，对他们更是镜花水月。到头来，你的理论不过是为精英消费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说辞。”

这个批评必须被正面接住。

第一步：承认这个批评精准地命中了“重度发生”被资本收编和商品化的巨大风险。任何一种能够产生真实信任的稀缺资源，在市场上都会被立即盯上、定价、并最终被转换为可炫耀的地位商品。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能。David 的公信力一旦建立，品牌就会蜂拥而至，试图用赞助、合作来收编那个公信力——不是收编“他这个人”（他有职业操守），而是收编“独立评测”这个模式本身：资本会投资大量“看起来独立”的评测媒体，复制 David 的一切外在形式（自费购买、长期测试、手写笔记），唯独抽掉那个实质性的内核——检验者与被检验对象之间的经济利益独立性。这正是“重度发生”作为一场市场结算的悲剧性矛盾：它的稀缺性一旦被市场确认，资本就会立即接手，将其降格为一种可被复制的文化符号和营销策略。“独立评测”变成一种风格，“手作”变成一个品牌标签，“长期使用”变成一段可以被 AI 生成配上精美照片的营销文案。

第二步：指出批评者的范畴错误。他将“重度发生”与“昂贵的精英体验”直接划了等号，但“重度发生”并非一个单一维度的、昂贵的商品清单。它是一种特定的价值发生方式——这种方式的核心特征，是强制要求不可逆的身体时间投入和不可协调的独立意图的参与。它在经验上可以体现为昂贵的形态（米其林餐厅、大师手稿拍卖、高端心理咨询），也可以体现为几乎不需要金钱成本的形态——一个母亲为自己孩子手作的一顿并不精致的生日晚餐，朋友之间一次放下手机的、面对面的长谈，一个社区的老年人在公园里自发组织的晨练小组。这些形态的“重度”，不在它们的市场定价，而在它们作为独一无二的、凝聚了特定时间、特定情感劳动、特定身体在场的事件，其发生过程无法被算法模拟或替代。

问题的关键，因此不在于“重度发生”这个概念本身是否具有阶级性——它没有；而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系统性地剥夺大多数人进行这种发生的能力的经济体系之中。当零工经济下的劳动者需要同时在三个平台打零工才能维持生计，他们为自己孩子手作一顿生日晚餐的时间、精力和情感带宽，在结构上被剥夺了。当城市空间被商业地产切割得支离破碎时，低收入社区里那些可以让孩子攀爬、让老人乘凉、让邻里闲聊的公共空间，正在从城市地图上消失。AI 的全面渗透——不是作为一种哲学问

题，而是作为一种被资本部署的生产力工具——正在加速这种剥夺：它用无尽的信息流、算法推荐和即时满足，填满你所有原本可以用来“无所事事”、发呆、与身边人真实共处的时间缝隙。

因此，本文所提出的框架，其最深的政治经济学意涵，不应是为精英消费提供新的合法性说辞。恰恰相反，它的首要政策导向，应该是去追问：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保护和培育所有个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真实的、不可被算法化替代的体验、创造与陪伴的能力和空间？这包括但不限于：缩短劳动时间，保障劳动者有足够的闲暇来进行“无目的”的创造；保护公共空间，让人们有可以面对面相遇、交流、共处的物理场所；在教育体系中，抵制 AI 对学习过程的全方位代劳，保护学生经历那个宝贵的、充满挫败但不可替代的独立思考的发生过程——不仅仅因为这种过程“更有效”，而因为它是“思考”这个动作本身不能被压缩的发生学内核。

我称这种被保护的能力与空间为“发生权”。它不是一项新的权利清单，而是一个分析框架：它从 AI 资本主义的剥夺逻辑中反向逼出，指向那些必须被集体性地守护的、让具身共识得以生成的社会基础设施——时间、空间、制度条件。它的理论锚点不在“权利”这个法哲学概念，而在前文完成的那个发生学判断：独立意图的发生，需要在物质、制度、认知三个维度上同时满足条件；而发生权的核心，就是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而非仅仅是精英——拥有在这三个维度上不被资本和技术殖民的条件。这是本文价值论在社会政治层面的真正落脚点。

9.4 制度能否重新锚定信任？

最后，必须正面处理一个被此前悬置的问题：那些试图通过法律和监管来阻断空转回路的制度性努力——它们在发生学上处于什么位置？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案》要求平台披露推荐算法逻辑并标注 AI 生成内容；中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对 AI 生成内容施加了标识和水印义务。这些制度，是否正在从外部切断“价值空转”的回路？

从发生学的视角看，这些制度性修复努力，恰恰是“价值空转”的矛盾运动逼出来的对立面。它们不是外在于病理的干预，而是病理内部的“反作用力”——就像身体的免疫系统在病原体入侵时被激活一样。欧盟的监管，本质上是在试图用制度的力量，重建那条被 AI 截断的“说法”与“检验意图”之间的连线：通过强制披露和溯源，让那条 AI 生成的好评背后那个“空白的意图”重新变得可见、可追溯、可追责。

然而，必须诚实面对一个技术上的根本不确定性：这些制度性修复能否奏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AI 检测 AI”的军备竞赛的走势。如果一个足够复杂的 AI 生成的文本，在语义上已经无法被当前的检测技术可靠地识别，那么强制披露与标注的法律义务，在实操层面就可能成为一纸空文。更根本的是，全球化的电商和内容生态，使得监管套利——将 AI 生成内容的生产转移到监管宽松的法域——成为不可避免的策略。

但本文的理论并不依赖“AI 检测永远落后于 AI 生成”这一强假设。即使未来某一天，技术发展到能够完美地区分 AI 生成与人类生成的文本，价值空转的逻辑依然可能通过其他路径持续存在。最可能的替代路径，是本文称之为“人机协同造假”的模式：卖家不再使用 AI 一键生成全部评价文本，而是使用 AI 生成初稿，再由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廉价人类劳动者——零工经济下的“幽灵写手”——进行润色和个性化改写。这一步的加入，将使得最终的文本在“是否由 AI 生成”这个二元判据上变得完全不可检测，因为它确实有人类参与生产。但它在实质上仍然是一个被统一商业意图所协调的、系统性制

造虚假说法的操作。换言之，制度可能可以倒逼空转回路从“纯 AI 生成”升级为“人机协同”，但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重建已经坍塌的生成性链条。具身共识，因此不是在制度修复完成之后才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备选方案——它是在制度修复被证明有其本质局限之后，市场从废墟中自发逼出来的、最后的结算形态。

十、朝向一种关于“发生”的经济学：以“具身共识场”为分析单位

传统互联网经济学，究其根本，是一门关于“信息”的学问。它的核心叙事，围绕着如何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匹配效率来展开。在这个范式下，市场是一台巨大的、用于“发现”偏好的机器。AI 时代的经济学，其历史使命的正在发生位移。

当信息的成本因 AI 而趋近于零，并同时陷入绝对的通货膨胀与“价值空转”的危机时，市场的核心功能，便从对存量信息的“发现”，滑向了对“具身共识”的催化与守护。真正的稀缺，不再是那个被层层说法包裹、被各种数字标注的商品，而是那个商品背后的、即它是否及如何被一个具身共同体所冗余地检验和确认的“发生史”。经济学在此刻必须直面一个沉默的转向：从一门研究理性主体如何在给定偏好下进行选择的科学，升维为一门研究“价值之发生过程”及其信任生产的科学。

这门新的经济学，需要一套全新的分析单位。它不再是孤独的“商品”、理性的“个人”或代表终点的“均衡价格”。它的分析单位，可以被构想为“具身共识场”——一个由人、物、技术与制度构成的、能够催生并守护关于某种价值之“具身共识”的纠缠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数字与 AI 被严格约束在工具的位置上，成为“过程记录者”和“辅助分析者”，而不再僭越成为发生过程的替代品或共识的伪造者。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容易被误解的理论关系。当本文用“共识发生成本”和“共识性租金”这些概念来勾勒这个框架时，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在借鉴奥利弗·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但两者的关系应该被精确地倒过来：不是本文的概念借鉴了威廉姆森，而是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概念，只有在本文所描述的“价值空转”时代，才暴露出其最根本的、关乎“发生”的不可逆内核。在威廉姆森的经典模型中，资产专用性指的是某项资产（如一套专门为特定交易伙伴定制的机器）一旦投入，就难以移作他用，因而构成了交易双方的相互锁定，需要特定的治理结构来防止机会主义。这个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在“价值空转”时代之前已经得到广泛验证。但当 AI 可以将任何“描述”瞬间生成之时，资产专用性最深层的含义反而被反向照亮：消费者一旦对一个特定的“具身检验场域”——如 David 的独立评测、一所坚持当面互评的研讨课——投入了真实的、不可逆的时间与身体学习成本，他们就形成了一种无法被任何 AI 工具瞬间复制的专用性资产。这种资产不是机器或厂房，而是那个场域在消费者的具身检验史中留下的、包含了大量冗余与矛盾痕迹的发生过程。正是这种专用性——它的不可移作他用、它的无法被算法瞬间重现——赋予了那个具身共识场域更高的“可信承诺”价值。具身共识不只是一个认知概念，它同时也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在 AI 时代的最前沿阵地：“发生”本身，就是一种终极的专用性投资。不是“共识发生成本”借鉴了“资产专用性”，而是资产专用性在 AI 时代的最极端形态，恰恰就是“发生”本身的不可逆性。

这个框架并非在为未来立法，也不是在为一个新学科编写术语表。它只在回应前文已经逼出的一个实践问题：当 AI 把信息成本打到零、同时把信号-信任链条截断之后，我们应该用什么分析单位来命名那些在废墟上正在发生的、反向的信任重建运动？那些运动不发生在“商品”层面、不发生在“平台”层面，而发生在具体的、由独立意图驱动的、要求身体与时间投入的“场域”之中。具身共识场，就是为了命名这个正在发生的、尚不被传统经济学范畴所捕捉的现实而被逼出来的概念。

在此框架下，AI 时代的伟大企业，将不再是那些在“撮合交易”和“信息匹配”上做到极致效率的平台。它们将更可能转变为那些学会如何创造并守护一个“让某种特定的、高价值的具身共识持续发生”的场域的组织。利润不再是检验企业是否高效满足社会需求的终极信号，而是检验企业是否成功守护了某个高价值“具身共识场”的回报。在这一视角下，反垄断政策的对象，可能不再仅仅是市场份额，而是某个平台是否通过制造“价值空转”，系统性地扼杀了其他“具身共识场”的生存空间。消费者保护的目标，不再仅仅是信息的“真实性”，而是消费者是否被赋予了进入和参与真实“具身共识场”的能力与权利。公共品的定义，从灯塔、国防延伸至——“可发生性”：一个社会能否保障其成员拥有不被虚假信息和算法殖民的、可用于进行真实的身体体验、创造挣扎和有意义陪伴的物理时间、公共空间与制度条件。这正是第九部分所命名的“发生权”的制度化表达。

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展望，不是一个完整的框架。它的根基——具身共识、价值空转、重度发生——仍需要在更广泛的经验领域和理论传统中被检验、被挑战、被修正。但它标示了一个方向：当 AI 把信息成本打到零、同时把信号-信任链条截断之后，经济学不能再只研究“选择”，它必须开始研究“发生”。

十一、结论：在空转的轰鸣中，守护独立意图的发生条件

本文的核心论点始于一个发现：生成式 AI 对经济学最深层的冲击，并非效率革命或劳动替代，而是一场根源性的“价值空转”。它史无前例地赋予了“数字”自主生产“说法”的能力，从而瓦解了互联网时代那套以“数字为说法定价”的旧契约——其默会前提“身体先检验，信号后出现”的时间之箭被技术性地截断了。空转回路的发生遵循一条现在可以被清晰指认的路径：AI 说法预售信号（虚假种草帖）→ 被诱发的真实消费者行为在平台算法的本体论盲区中完成“数字洗白”（销量、排名、星级）→ 数字信号触发资本的道理生产（AI 辅助的品牌简报与投资叙事）→ 道理吸引更多消费者和更多 AI 说法的投入，完成回路的闭合与加固。这个回路在电商与内容产业中共享同一套发生学骨架，区别仅在于被劫持的肉身行为的形态——购买行为或注意力行为。它的核心病理不在于信号失灵，而在于整个信号-信任链条被一个从未在物理时空中真实发生过的“幽灵事件”——AI 生成的虚假共识——所启动并自我维持。这不是经典信息经济学中路径依赖的又一变体，而是一种此前未被理论化的虚构锁定：整个经济正反馈大厦的基座，不是历史中的偶然事件，而是符号学上的虚构。

在“说法-数字-道理”旧三角因无限通胀而崩溃的废墟上，本文论证：信任的生产，存在一个不可被算法逾越的物理-生物性约束——它必须经由大量独立观察者用自己不可逆的身体和时间作为赌注，进行冗余、浪费且无法被任何中心化算法统合的交叉检验，最终凝结成“具身共识”。AI 对这一价值-信任转化链的系统性短路，使得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去肉体化”危机。抵抗这场危机的据点，因此不在于发现任何尚未被污染的“信息”或“商品”，而在于：当虚假信号的“轻”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灾难时，那些无法被算法压缩的“重”——身体在场、时间投入、创造性挣扎——其市场价值被反向逼升出来。这就是本文所命名的“重度发生”，但它不是被发现的净土或被回归的本质，而是被空转危机逼出来的次优结算。

本文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转向的历史性和矛盾性。具身共识本身在历史上并非一块净土——它曾被宗教仪式和权力制度用来制造最大规模的虚假共识。当代“重度发生”场域与前现代“操纵性仪式”之间的根本分野，不在于“身体是否在场”这一物理事实，而在于检验者的意图是否受到一个统一的权力中心或算法逻辑的协调。由此，本文的终极锚点从“身体”推进到了“独立意图的发生条件”：物质独立（检验者的经济基础是否独立于被检验对象）、制度交叉检验（是否存在一个能够交叉检验并惩戒虚假检验者的共同体）、认知冗余（检验者是否经历了足够长、足够多样、包含内部矛盾的具身检验过程）。只有当这三个条件同时被满足时，具身共识才能导向真实的信任而非虚假的操纵。守护“发生权”——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拥有在这三个维度上不被资本和技术殖民的条件——而不是守护某种精英消费的合法性，才是这一理论建构的真正政治经济学意涵所在。

最后，本文的整个理论大厦建立在一个可被检验的、关于人类信任行为的硬性假设之上。本文的核心概念——具身共识、价值空转与重度发生——的可证伪条件是：若有持续且可重复的实证证据表明，完全由 AI 驱动的、闭环的“说法-数字-道理”系统所培育出的品牌或体验，能在大规模、跨文化的长期研究中，比依赖传统“复杂具身检验史”和“重度发生”模式的 brand，展现出更强韧的消费者信任度、更高的代际传承忠诚度、以及更能承受信任危机冲击的恢复力——那么，本文关于“信任存在一个无法被技术穿透的、以独立意图的交叉检验为硬核的具身性约束”的核心判断，将被证伪。那将意味着，人类的深度信任机制，本质上只是一个可被技术手段完全重写的、纯粹的文化软件。

在那一天被经验证实之前，守护每一个普通人在自己生活中投入真实身体的重量、进行不可逆的创造与检验的权利——以及守护那些让这一权利不被一个统一算法协调所取代的社会条件——将是这个被AI 虚假轰鸣所席卷的时代里，经济学最值得坚守的物理与伦理双重底线。

参考文献

- Akerlof, G. A.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3), 488–500.
- Baudrillard, J. (1981).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Paris: Galilée.
- Callon, M. (Ed.). (1998). *The Laws of the Markets*. Oxford: Blackwell.
- Hayek, F. A. (1978).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In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pp. 179–19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cKenzie, D. (2006). *An Engine, Not a Camera: How Financial Models Shape Marke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Spence, M. (1973).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3), 355–374.
- Williamson, O. 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